

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

王沪宁

[内容提要]把文化看作一种软权力,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崭新观念。人们已经把政治体系、民族士气、民族文化、经济体制、历史发展、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看作是构成国家权力的属性,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发散性力量正使软权力具有国家关系中的权力属性。总的软权力态势对谁有利,谁在国际社会中就占据有利地位,目前影响国际“软权力”势能的因素是工业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软权力的力量来自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

1 时下文化的地位日益兴隆,一个新颖的概念在世界上不胫而走,引起人们及各国政府的高度注意,这就是“软权力”(SOFT POWER)的概念。“软权力”是与“硬权力”相对立的概念。“硬权力”指一定国家和社会的军事力量、自然资源和其他有形物质的力量。近代以来,“硬权力”历来是国家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引人注目。军事机器、自然资源、国土和人口等要素历来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尺度。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上的历次冲突和较量,基本上以“硬权力”为中轴。远的不讲,两次世界大战最后都是战争机器的较量和国力的较劲,虽然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道义上和士气上能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人们从未把“软权力”提高到“硬权力”的地位上。整个冷战过程中,美苏两国的主要的竞争也是围绕“硬权力”展开的。从常规武器的竞争,发展到战略武器和核武器的竞争,从地面的竞争发展到空中的竞争,从海洋的竞争发展到宇宙的竞争……均是为了在“硬权力”上压倒对方。新鲜的案例就是海湾战争,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新技术和高科技的军事力量,使用的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激光制导炸弹、卫星侦察、巡航导弹、爱国者导弹、红外线夜视仪、隐形飞机、以及军事作战的能力,使人们第一次真正领略了现代“硬权力”的厉害。而时隔不久,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变却改变了人们对权力的观点,也改变了国际的权力势能。

托夫勒从一个角度论述了权力的实质性变化,

可以说他是想重新规定权力的新本质。他提出当今世界上,权力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他把权力的基础分为三个主要的支柱:暴力、财富和知识。在当代社会中,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因为现在正是权力转移的黎明期。我们生活在赖以将世界拴在一起的整个权力结构正在解体的时期。一个迥然不同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①这个“迥然不同的权力结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托夫勒断定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知识越来越成为权力的主要的支柱。权力可以分成“高质权力”和“低质权力”两个范畴。知识构成的权力是“高质权力”。知识本身可以使暴力和财富增值。知识构成的权力与暴力和财富构成的权力截然不同,众人不能同时使用一杆枪,众人也不能同时花费一块钱,而众人可以同时使用同样的知识。知识的这个特征使权力的结构发生变化,“明天在所有人类领域出现的全球性的权力之争的核心,就是如体控制知识。”^②托夫勒的观点有启发意义,因为在当代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文化因素(比知识更大的范畴)是世界性流动的因素,它所构成的“软权力”的支柱是难以垄断的,这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的变革。文化的传播总是体现一种趋势,可以超国界传播,一旦一种文化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时,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获得了更大的“软权力”。

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纳伊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提出“软权力”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日益显著。他的论点是:冷

战已经结束,前苏联分崩离析,东欧国家转变形态,国际格局今非昔比,需要认真反思,确定新的战略。过去人们相信测试权力的唯一指标是军事力量,今天这个古老的标准已经不敷为用,权力日益依赖于教育、技术和经济发展等因素,而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力量等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下降。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所以国家安全的目标已经不能完全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如今天经济成长和生态问题对一个国家的安全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大国用传统的权力手段已经不能奏效,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加深,跨国集团的增加,弱国的民族主义,工艺的扩展和政治问题的转变,均使权力发生变化。纳伊也提出了“权力转移”的观念,认为权力从“资本密集”(CAPITAL-RICH)转向“信息密集”(INFORMATION-RICH)。在今天的世界上,权力的行使本质上是设定国际政治议程和结构的能力,让别人改变自己特殊立场和状态的能力^⑧。纳伊称这种权力为“软合作权力”(SOFT COOPTIVE POWER),对应于“硬命令权力”(HARD COMMAND POWER)。他的基本的立论是: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它的权力在别人眼中是合法的,它的愿望就较少会遇到抵抗,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有吸引力的,他人就会自动地追随。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与它的内部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它就没有必要改变自己。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支持一个国际制度,其他国家均愿意通过这个体制来协调它们的活动,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硬权力。

一般意义上讲,权力是A控制B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或者说,是A让B做或不²做某种行为的能力。A的这种控制能力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实现:一是运用较为传统的方式,就是强力,如拿刀或拿枪,或者用超人的臂力来强迫B依照A的意志来行为;二是靠财富,如用金钱或其他有形的财富来使B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为;三是用知识,即通过理性的推理和理性的认识来促使B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为。权力的基本支柱就是这三个方面。从古至今,权力总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力量的。在不同的条件或情景下,这些因素的地位有所不同。这些因素可以称之为权力的基础。权力的基础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演进,在古代,暴力的地位相对较高,越往现代发展,财富和知识的地位越上升。在今天这个“信息社会”中,知识的地

位日益突出。其他因素并非无所作为,而是相对衰弱。在国际政治中,人们通常认为权力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实现自己愿望和意志的能力,意味着让其他国际和社会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意志行事的能力。反过来讲,是使别国不做与自己的愿望和意志相悖的行为的能力。这种权力总体上以一个国家的实力为基础。在国际权力学上,权力与实力差不多是等量齐观的。权力以实力为基础,权力以实力为前提。

关于权力的“软体”部分,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早有论述。约翰·洛维尔分析了文化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提出了一幅解构图表:长期政策方向→地理、人口、政府、经济体系;文化→神话、理想、利益、形象、解决问题的习惯;短期政策计划→贸易模式、联盟、外交规则、国际组织、政策和班子、公共舆论;特殊行动决定→外部挑战和机会、内部事件和要求、政策议程^⑨。但是这是不够的,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政策的背景,而且是一种权力,或者一种实力,可以影响它国的行为。从把文化视为一种权力的角度看,人们的主要论述有以下主要的方面:

1 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可以构成国家实力的基础。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如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的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权力或实力。约翰·斯巴尼埃认为:权力有三层意义:一是人们往往把权力等同于军事能力,二是权力是人们认为的那种力量,三是权力的声望会增加权力本身。权力的基本要素是地理、人口、自然资源、经济能力、军事力量、政治系统和领导层、民族士气。前面的部分当然属于“硬权力”。后面的部分属于今天讲的“软权力”。斯巴尼埃强调国家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被用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权力是怎样加以动作的,政治权力做出的决策是否合理,能否得到社会的支持,权力的运作能否产生合理的结果,国家采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手段是否符合社会的价值观念。这里牵涉到政治系统的效能问题。政治系统有的集中权力,有的分散权力。在集中的情况下,决策反映可能较快,而在民主体制下决策速度很慢,但是民主体制决策可能错误较少,集中决策错误的可能性可能较大^⑩。政治系统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决定着一定国家的实力。

2 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可以构成国家实力的基础。有的学者就提出,民主士气指称国民对国家

的忠诚和对政策的支持的程度,尤其是爱国主义的精神^⑧。民族的精神面貌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来看,的确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或实力有一定的影响。一个没有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的国家或民族,在当代世界上,虽然武装到牙齿,或富甲天下,但其实际的权力不可能达到应有的程度。

3 社会的国际形象可以构成国家实力的基础。人们在国际社会中生活和活动,有一个国家形象的问题,国家形象涉及国家的信誉、国家的表现、国家的行为、国家的风格、国家的评价、国家的舆论等方面。科伦比斯和沃尔夫认为国家的权力可以分为有形权力和无形权力两个方面,有形权力的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农业能力、军事力量和机动性等,无形权力包括领导层和人格、官僚组织的效力、政府类型、社会一体化程度、声望、国外支持和国外的依赖^⑨。这里谈到了国家的声望的问题,其实声望是一种无形的权力,但是这种无形的权力往往使国家的国际行为能够事半功倍。

4 国家的对外战略可以构成国家实力的基础。国家在国际上活动,总有自己的总体对外战略。当然也不排斥一些国家没有系统的对外战略。现代国家大部分均制定系统的对外战略。恰当的战略往往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得心应手的重要条件。巴普相信国家的权力除硬的指标以外,领导方式、内部组织、战略也是重要的方面。这里提出战略也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对这个论点有不同的看法^⑩。战略本身是一种文化,同时它反映着社会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战略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是知识的结果,是群体心理的动态结果。对外战略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牵联到人们对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认知,意识形态的选择,价值观的确定,等等。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权力,有战略的强于没有战略的,有较好战略的强于一般战略的,有总体战略的强于有局部战略的,有长远战略的强于有近期战略的。

5 确定国际体制的能力可以构成国家实力的基础。现代国际政治的进程表明,一个国家如果能够确定或者倡议一种国际体制,就能够扩大自己在国际社会的权力。这个状况过去主要在经济领域中存在。如确定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和贸易理论、国际货币政策等。世界上存在几个主要的全球经济体制,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1947年

开始形成的关贸总协定(GATT)。这些体制的建立实际上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权力,也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国家权力^⑪。这里的关键就是这些体制基本上是根据美国的理论和体制建立的,也适应于美国在战后获得的独霸的地位。目前,时过境迁,这套体制本身受到挑战,这套体制的理论基础受到挑战,美国的国际权力有所削弱。现代世界的逻辑是,谁能够确定国际体制,谁就能从中获得额外的国际权力。

6 科学技术可以构成国家实力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对国家权力的作用可能是各种权力基础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不需要再加以重复的命题。哈特曼特别强调了科技构成权力的重要因素,他举的例子是,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统治着空间的开发,因为只有他们有这样的科学技术力量,它们构成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⑫。科学技术构成国家权力的事实,不在于科学技术带来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大幅度增长,或者军事装备的更新换代,这些对国家权力是重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总体上给国家权力的基础带来的贡献就更为基本和关键。

此外,泛权力主义者将一切均视为国家实力的构成要素,颇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但是也不乏道理。埃斯泰勒·约根森分析说音乐在国际关系中也重要的作用,他提出音乐构成了政治家影响他人的一种重要的手段,音乐本身也可以塑造国家的形象,音乐与一个社会中政治家和民众的人格有关,可以鼓舞人们的爱国主义,起到教育的作用,也是宣传的手段,也可以促进人们的合作^⑬。文化的地位越来越具有发散性的功能,政治越来越世俗化,音乐起这样的作用也不足为怪。

文化作为国家实力的观点早就被人们所注意。在分析和考察国家权力时,人们历来把这些无形的因素视为国家权力的基本支柱。上面提到的政治体系的因素,民族士气和民族文化的因素,经济体制的因素,历史发展进程和遗留的因素,科学技术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因素等等,从广义的角度讲,都是文化的范围。在当代人类政治的新态势下,文化这个因素重领风骚,引起了人们的高度的注意。讨论一个国家权力或国家实力,很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留意文化的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软权力”获得了与“硬权力”一样或者更为重要的地位。

值得提醒的是,以上所有的人分析注重的是,“软权力”构成国家权力的属性,但是没有注意它们

的发散性的力量,即作为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属性。对“软权力”这一性质的认识,是今天的时局和条件演化的结果。可以说,在冷战结束以前,人们的认识不够充分。沃尔克认为过去人们忽略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⑤。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使“软权力”成为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基本力量,这个总格局的变化,是今天人们应该高度重视“软权力”事实依据。

确定了“软权力”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这里有必要来讨论国际社会中的“软权力”的总格局,即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总的“软权力”态势对谁有利,谁在国际社会的“软权力”势能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软权力”与“硬权力”有所不同,“硬权力”基本上可以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得到和扩展,而“软权力”更加依赖于国际间对一定文化价值的体认,依赖于一定的体制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所以国家的“软权力”更加依赖国际文化的势能,即国际整个文化和价值的总趋向。总体来看,目前影响各个国家和社会的国际“软权力”势能是由以下的因素构成的:

1 工业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势能来自于近代以来的工业主义,工业主义发源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和扩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产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应用,而且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和一种文明的传播。工业主义的发展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传统社会的结构。可以说,从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趋向就是工业主义取代农业主义,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以往,农业文明的国家都曾长时间地抵御工业文明的侵入,如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浴血奋战,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对待西方的态度。工业文明也往往是借助于强制的力量和超经济的手段来排斥农业文明的,如西方国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长时间的殖民统治。马克思早就透彻地看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⑥问题是只要工业主义不借助于超经济的力量就不能构成“软文化”的势能。但是,二次大战之后,尤其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主动地追求工业主义,抛弃农业主义。今天,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或社会不在追求工业主义。因而工业主义构成了一种势能。

结果是,工业发达的社会和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具有较大的“软权力”。工业主义的发展当然会增加“硬权力”,但是今天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发展对“软权力”的规定。

2 科学主义。在工业主义发展的同时,另外一种重要力量也发展起来,并在世界范围内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就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指的是科学本身的力量和人们对科学的一种崇拜。科学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使科学在技术生活和人文生活中获得了无以覆加的地位。科学技术本身大有成为意识形态的趋向,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科学主义的发展一方面意味着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改变社会和改变世界的力量,科学技术正按照自己的逻辑改变人们的生活格局和世界的格局。另一方面,人们倾向于相信科学技术是最真实的真理,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科学技术往往有摧枯拉朽的力量。马克思在分析科学技术对印度社会的作用时说“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粗暴的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机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⑦以一定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会传递到其他地方。科学导致的科学的或非科学的结果,科学导致的社会和非社会的结果,均将随着科学的普及而普及。科学主义形成了一种文化。科学技术成为最有说服力的力量。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提出科学技术、知识已经成为今天最重要的权力实质^⑧。因而今天世界的第二个势能是: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和社会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软权力”势能。

3 民主主义。当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软权力”第三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成为世界发展一个重要的方向。二战以后,民主主义运动,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现代化的全面发动,使人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利益要求,人们参与政治的愿望日益强烈,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均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尽管民主政治或者民主主义本身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如马克思说的民主与西方启蒙时期思想家说的民主是两回事,民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有着本质不同的规定性,但是作为一种方向来讲,民主主义是共同的趋势。当代民主主义发展的态势,似乎是以西方发达社会

为基础的民主模式略占上风,而东方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模式处于低潮。当代民主主义的发展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民主主义与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前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联系在一起,但是表现形态却是对苏联式民主模式的否定。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列于世界前列,因而衬托了它们的民主模式。其实,西方的民主模式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如美国的“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美国洛杉矶黑人的种族暴动,日本的“里库路特案件”和“佐川急便案件”,法国的电话窃听事件和“彩虹勇士号”事件,德国的部长利用权力促销活动,意大利政党接收贿赂,英国财政大臣动用公款办私事等等。不过,现在关键不是发现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这是确定无疑的,关键是认识到在国际政治的格局中,各个国家可以从民主主义的势能中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民主主义是今天世界上决定“软权力”势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4 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构成当今世界权力势能的第四个重要的方面。冷战结束之后,在大国高压体系瓦解之后,民族主义的思潮和运动突然抬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东欧国家的转变夹杂着民族主义的情绪,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离也是以民族主义的形态出现的,独联体内部的盘根错节的矛盾冲突也有民族主义的背景,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乱和纷争与民族主义的运动交织在一起,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更是厉害,受到宗教的催化,就连发达国家之间,原本已经式微的民族主义又重新抬头,如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摩擦,大西洋两边的嘴角,等等,均证明了民族主义的力量。民族主义有多种形态,目前来看主要的形态有合国家民族主义,跨国国家民族主义和亚国家民族主义三种主要的表现形态。从特征上来说,又有政治趋向的民族主义、经济趋向的民族主义、文化趋向的民族主义和历史趋向的民族主义之分。从国际格局的状况来看,跨国国家的民族主义最容易构成国际“软权力”的势能。如犹太人的分布,在以色列只有全世界犹太人的16%,在美国有44%,前苏联有19%,其他分布在四十多个国家中;阿拉伯人分布在三十七个国家之中;马来人分布在七个国家中;中国人分布在二十七个国家中;日耳曼人分布在二十八个国家中;等等。这样的分布实际上对主要民族国家在国际“软权力”势能的地位上是有

利的。中东地区各国虽然差异很大,但是在民族主义方面各国均获得了较强的“软权力”,西方国家虽然拥有绝对的“硬权力”优势,在这个地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关键就在于“软权力”空虚。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国际“软权力”的势能必然会受到影响。

明确了“软权力”在今日国际政治中的得天独厚的地位,各国在考虑自己的对外战略时,在确定增加国家权力的发展战略时,就应该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国际关系著名的现实主义理论家汉斯·莫根索认为:如同所有的政治一样,国际政治是争夺权力的斗争。不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始终是中间的目标^①。不论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有多大,适用性有多广,国际社会各国尽量扩大自己权力是一个事实。当然,各国扩大自己权力的目标是不同的,有的是为了威慑或统治他国,有的是为了侵略或要挟他国,有的是为了保护或强化自身,有的是为了帮助或支持他人。根据前述,今天国家要增加实力或权力,不能不注意“软权力”在国家权力中占的地位。任何一个合理的和可行的增加国家权力的战略均不能遗忘“软权力”。

普鲁士的著名的军事家克劳塞维兹相信“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马克思认同这个定理。斯巴尼埃把这个套式改了一下,提出“和平是上一次战争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②。从今天“软权力”取得的地位观之,应该说:文化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当今世界上,国家权力和国家实力当然也表现在用战争手段和经济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导致了伊拉克军队的撤军,美国对巴拿马的军事行动导致了诺列加政权的倒台,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催化其内部的政治裂变……但是,在冷战以后,人们必须用新的视野来看待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尽管上述的表现形式依然存在,但是新的形式更加有意义。古往今来,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的高低在于确定国际社会政治议程的主导能力的大小。旧形式往往是大国通过武力或超强的经济力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新形式是:文化对这个过程具备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软权力”可以经常被使用,而“硬权力”今天已经不能频繁地加以使用。

这个新形式与国际“软权力”的势能相关。谁的“软权力”构成最适应国际“软权力”的势能,谁就能

更有力地影响国际政治的议程。纳伊在分析美国的“软权力”的优势时说,美国的优势来自于,确定了管制国际经济的体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自由市场的原则、34%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美国文化的世界性的冲击波(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民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美国出口世界上最多的电视节目,比第二大出口国英国多七倍;美国有全世界唯一的全球性的电影发行网,美国电影生产只占世界总量的6—7%,但是占有了世界电影放映时间的50%,1981年占世界数据转移和处理量的80%),美国是世界上对移民最开放的国家,如此等等^①。这些因素对美国的国家实力均有加权的作用。

所以从一个国家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中发展国家实力的战略考虑,从“软权力”来看,应该在工业文明的推进方面,在科学技术大发展方面,在政治系统的现代化方面,在本国文化的国际化和国际文化的本土化方面,在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国际认同方面多下功夫。把发展“软权力”置于战略的高度,是当今国际政治格局的总的要求,也是整个九十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

“软权力”的发展战略与“硬权力”有所不同。工业主义或者讲工业文明是一种“软权力”,但是工业能力和经济能力本身是一种“硬权力”,关键是工业主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如市场机制、贸易主义、法律规范等等是软件。科学技术是“软权力”的核心支柱,当然科学技术本身可以成为“硬权力”的基础,它所体现的知识的属性是软体。谁是科学技术的创造国和输出国,谁就有可能影响国际社会。汤因比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人们放弃自己的传统技术而用外来技术来取代的话,那么就会慢慢影响到一定社会的深层,最后使整个传统文化的地基都被动摇,进而所有外来文化就会通过外来技术进入这个社会^②。

接受一定的文化,往往就会引起心理和感情的向往,理性的认同。凡是来自这种文化圈的东西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显然,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地越广,其潜在的“软权力”就可能越大。有些人说中国在这方面颇有优势,因为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已经传播到周围地区,华人也呈一种世界性的分布。但是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不是一种猎奇式的爱好,如对老子无为学说的迷恋,对佛家遁入空门的向往,或者对古董收集的偏好,而是对一种文

化的内在精神和基本价值的体认。中国文化要起到强健的“软权力”的作用,要经历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变革。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仍感觉不良,后来发现主要的问题在于日本虽有繁荣的经济,但是没有创造人类生活价值的文化,这些文化在西方国家,故日本提出要建立“生活大国”的口号,本质上也是为强化“软权力”。

“软权力”与“硬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是:“软权力”本质上具有非垄断性和扩散性。“软权力”的基本构成成份不能由一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来垄断,不同于“硬权力”的基本构成成份,如对核技术的垄断、对空间技术的独霸,对远程导弹的控制,对自然资源的拥有,对领土的主权等等。“硬权力”的基本力量在于这种垄断性。与此相反,“软权力”的基本力量在于它的非垄断性,文化和知识是不能垄断的,文化和知识越是传播,“软权力”越大,越垄断,力量越小。“硬权力”包含的科学技术,如大规模杀伤武器需要极其先进的科学技术,虽然可以垄断,但垄断的本质是武器本身,科学技术依然是难以垄断的。

“软权力”的力量来自其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而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的支柱。“软权力”基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是一种广义的信息,德鲁克言,信息早已跨越了国界^③。当代国际社会生活中,文化的“超国界行动”正是“软权力”的总的势能。

注:

①②⑤[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转移》,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第9,第28页。

③⑥JOSEPH S. NYE, JR. SORT POWER, FOREIGN POLICY, NUMBER 80, FALL 1990, PP. 167, 168-170。

④约翰·洛维尔,第96页。

⑤⑦⑧JOHN SPANIER, GAME NATIONS PLAY: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81, P. 131。

⑦ THEODORE A. COULOUMBIS AND JAMES H. WOLF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AND JUSTICE,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78, PP. 56-73。

(下转第75页)

②②魏源：《海国图志》。②③孙中山：《〈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

②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

②⑤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

②⑥钱玄同：《回语堂的信》，《语丝》第23期，1925年4月。②⑦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收入《胡适文选》，1930年。

②⑧胡适：《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3号，1934年6月。

②⑨转引自严绍瑾：《日本鲁迅研究学派辨析》，《北京大学纪念鲁迅百年诞辰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⑩参见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11月）。这五种“爱国论”是：“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外国也有叫化子，或草舍、娼妓、臭虫”/“中国便是野蛮的好”，“你能把我们灭绝么”？

②⑪几年前台湾学者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流入大陆后，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即是明显一例。有关情况可参看《〈丑陋的中国人〉风波》，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年1月版。

（上接第96页）②⑫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84, PP. 380-390.

②⑬FREDERICK H. HARTMANN, THE RELATIONS OF NATIONS, SIXTH EDITI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83, P. 55.

②⑭JONSEUK CHAY, 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AEGER, NEW YORK, 1990, PP. 59-69, 70.

②⑮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

②⑯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页。

②⑰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973.

②⑱[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264页。

②⑲[美]彼得·德鲁克：《新现实》，上海三联书店，1992，第201页。

（上接第107页）③⑳[美]哈罗德·F·戈斯内尔等：《美国政党和选举》。上海译文出版社，复旦大学国政系译，1980年，第327~328、329、332~333页。

③㉑[美]约翰·奈斯比特等：《九十年代世界发展十大趋势》，师晓霞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274~275、325页。

③㉒[法]迪埃里·沃尔东：《政治厨房——法国社会丑陋》，守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22~342页。

③㉓[美]托马斯·戴伊等：《民主的嘲讽》，孙占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78、243页。

③㉔[日]伊藤昌哉：《自民党战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0、86页。

③㉕Angeol - panbianco,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73-274.

③㉖[美]阿尔温·托夫勒：《前景与前提》，上海市未来研究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2页。

③㉗他石：《瑞士联邦700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第214、215页。

③㉘[丹麦]福尔默·威斯蒂主编：《北欧式民主》，赵振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1页。

③㉙[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33页。

③㉚[瑞典]斯·哈登纽斯：《二十世纪的瑞典政治》，戴汉笠等译，求实出版社，1990年，第148~152页。

③㉛[日]富森督儿：《战后日本保守党史》，吴晓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53页。

③㉜[美]加·A·阿尔蒙德等：《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0页。